第一章　嘉隆之交政治

第一节　世宗后期荒政与严嵩专权

一、世宗晚期的怠荒

武宗荒嬉是随着明武宗的归西而结束的。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时期，也是一个统治溃败、危机四伏的时期。这时，明王朝面临严酷抉择：要么革新求治，维持统治；要么继续原路，迅速灭亡。

明武宗死后，杨廷和以《皇明祖训》中“兄终弟及”说服外廷和后宫，因而将宪宗之孙、兴献王朱祐杬之子朱厚璁推上皇位，以 1521 年为嘉靖元年，庙号世宗。朱厚璁继位伊始，一场政治冲突很快拉开序幕，即“大礼议”事件。大礼议”是杨廷和集团和张琮、桂萼等大

礼派之间的政治斗争。如果把“大礼议”仅仅视为一般的权力斗争，确也与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的逻辑相吻合。但是，大礼派夺权后所倡行的革新运动给这场斗争赋予了新的涵义，即它与一场变革相联系。所以说，对“大礼议”积极的且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显得非常重要，否则，就很难论证嘉靖前期革新的产生缘由。田澍先生对“大礼议”与嘉靖革新的关系已经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。他认为，“大礼议”是一场适时的廷议，是明中期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人事变革。这场变革使大礼派登上政坛，完成了政权的重新组合，推动了革新的到来。而这场变革的意义在于，它不但化解了武宗荒嬉带来的迫在眉睫的危机，而且挽救了明王朝，使明朝历史得以延续。①

然而，世宗从一开始就好祥瑞、信方术，在长生不老的追求中使革新求治渐渐驶入慢车道，以至专事方术，不理朝政，嘉靖政治从此急剧下滑。史家言：“世宗起自藩服，入缵大统，累叶升平，兵革衰息，毋亦富贵吾所已极，所不知者寿耳。以故因寿考而慕长生，

① 田澍：《嘉靖革新研究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1 年，第 6-8 页。

缘长生而冀翀举。惟备福于箕畴，乃希心于方外也。”[①]最初，对于大臣的劝阻还只是不予理会。史载：“（嘉靖二年闰四月，1523）大学士杨廷和上慎始修德十二事，而于建斋醮一事首力言之，谓：祈祷之事，帝王弗尚。何况僧道邪妄之书，岂可轻信！”[②]这时，世宗并没有过激反应。但到后来，他不但勃然大怒，还将谏劝之臣下狱拷掠。嘉靖九年，兵科给事中高金上疏，要求“削元节真人号”（邵元节于嘉靖三年被召入京，五年封为真人），世宗大怒，将高金“立下诏狱拷掠”。[③]世宗对方术的迷信变成了对方士的迷信以至给他们加官晋爵。嘉靖十五年，邵元节授礼部尚书；嘉靖十八年，方士陶仲文特授少保、礼部尚书；其他如“小人顾可学、盛端明、朱隆禧辈，皆缘以进”。另外，为了长生祈祷，“简文武大臣及词臣入直西苑，供奉青词”，以至于“四方奸人段朝用、龚可佩、蓝道行、王金、胡大顺、

① 谷应泰：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五二《世宗崇道教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 年，第 11 页。

②《明通鉴》卷五〇，第 1350 页。

③《明史》卷二〇九《高金传》，第 5516 页。

蓝田玉之属，咸以烧炼符咒荧惑天子”。[①]大批小人、奸人涌进朝廷，参与朝政，给政治造成严重灾难，并吞噬着前期前期革新的重要成果，嘉靖政局开始发生质的变化，时间在嘉靖十九年。史载，其时，方士段朝用言：“帝深居无与外人接，则黄金可成，不死药可得。”世宗听后大悦，立即下了这样一道圣谕：“谕廷臣令太子监国，朕少假一二年，亲政如初。”圣谕一下，“举朝愕不敢言”，而杨最则抗疏劝谏，言：“陛下春秋方壮，乃圣谕及此，不过一方士，欲服食求神仙耳。……臣虽至愚，不敢奉诏。”但杨最以抗诏被下狱重杖而死。[②]这一圣谕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，是其对政事倦怠的公开宣言，但是，因为大臣反对而没有得逞。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怪事。嘉靖二十年，皇宫宫婢杨金英等十六人企图勒死世宗，“宫婢相结行弑，用绳系上喉，翻布塞上口，以数人踞上腹绞之。已垂绝矣”。[③]因为宫婢“不谙绾结之法”使世宗侥幸活下来，但这一事件加深了他对身边臣僚的怀

①《明史》卷三〇七《陶仲文传》，第 9896 页。
②《明史》卷二〇九《杨最传》，第 5515 页。
③ 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十八宫婢肆逆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 年，第 469 页。

疑，坚定了深居西苑、专求神仙的想法，政事几乎完全抛之脑后，求治之志荡然无存。对神仙丹药的追求渐至疯狂以至缺少人性。史载："用南阳人梁高辅者，修房中药，取红铅梅子，配以生儿未啼时口中血，名为含真饼者，服之而效。"[①]嘉靖三十一年选八岁至十四岁女子三百人入宫，嘉靖三十一年选十岁以下女子一百六十人入宫，都为炼丹用。[②]韦庆远这样评价世宗晚年："嘉靖晚年对神仙境界的执著追求，已经到了幻听幻觉，如痴如醉，丧失了一般常性的地步。"他还说："一种虚无缥缈的成仙要求，一个极度膨胀的基于自私的偏执，已经由祈福禳灾衍化成为无端的敏感和随时随事可触发的忌讳。"[③]

世宗好祥瑞、信方术，专求长生，使嘉靖政治遭到破坏。

首先，大批方士涌进朝廷并委以高官厚禄，如邵元节、陶仲文、顾可学、盛端明、朱隆禧、段朝用、龚可佩、蓝道行、王金、胡大

① 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，卷四《徽王世封真人》，第 120 页。

② 白寿彝总主编《中国通史》第 15 册，明代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99 年，第 1524 页。

③ 韦庆远：《明清史新析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95 年，第 92-93 页。

顺、蓝田玉、田玉等，严重地败坏了朝政，影响了嘉靖政治健康的发展方向。而且，嘉靖四十一年冬令御史姜儆、王大任“分行天下，访求方士及符箓秘书”，于是二人寻访江、浙、川、陕、云、贵、湖、广等十五省，耗时两年多，还朝“上所得法秘数千册，方士唐秩、刘文彬等数人”。①这些方士大多被赐以太子太保并担任工部尚书、礼部尚书等朝廷要职，堂而皇之地登上大雅之堂，慢慢地侵蚀世宗，也导引甚至左右着嘉靖政局。史载：“方士蓝道行以扶卟得幸，故恶嵩，上问：‘天下何以不治？’道行因诈为卟语，具道嵩父子弄权状。上问：‘上仙何不殛之？’答曰：‘留待皇帝自殛。’上心动，欲逐嵩。”②严嵩的辉煌时代是以一句卟语而结束的，这是一个相当滑稽的政治局面，也是一个相当奇怪的时代。

其次，嘉靖财政告匮。户科给事中郑一鹏言：“臣巡视光禄，见一斋醮蔬食之费，为钱万有八千。”③沈德符记载：“时每一举醮，无

①《明史》卷三〇七《朱隆禧传》，第 7903 页。
②《明通鉴》卷六二，第 1747 页。
③《明史》卷二〇六《郑一鹏传》，第 5436 页。

论他费，即赤金亦至数千两。”[①]在醮事上如此一掷千金的挥霍使嘉靖财政背上沉甸甸的负担，财政亏空变得日益严重。《明世宗实录》言：“（嘉靖二十八年）是时边供繁费，加以土木祷祀之役月无虚日，帑藏匮竭。”嘉靖三十二年财政支出竟超出当时太仓岁入银三百七十三万两之多。因而官吏拼命搜刮，“司农百计生财，甚至变卖夺田，受贿军罪，犹不能给。乃遣部使者括镤逋赋。百姓嗷嗷，海内骚动。”[②]财政危机引发官吏的横征暴敛，其连锁反应是社会的动荡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。

最后，世宗深居西内，不见朝臣，政事荒废。“帝自二十年遭宫变，移居西内，日求长生，郊庙不亲，朝讲尽废，君臣不相接，独仲文得时见；见辄赐坐，称之为师而不名。心知臣下必议己，每下诏旨多愤疾之辞，廷臣莫知所措。”[③]嘉靖皇帝对政事怠荒造成了极大的权力真空，除大批方士涌进朝廷外，撰写青词也成为飞黄腾达

① 沈德符：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《嘉靖青词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 年，第 59 页。
②《明世宗实录》卷三五一，嘉靖二十八年八月戊戌条，第 1295 页。
③《明史》卷三〇七《陶仲文传》，第 9896 页。

的途径，“青词宰相”屡屡出现。严嵩专权是这一时期又一显著特征，也是嘉靖后期怠政的必然结果。

二、严嵩专权

严嵩，字惟中，江西分宜人。出生寒门，少年聪慧。弘治十八年（1505）进士，被选庶吉士，入翰林院，才华初显。正德十六年升南京翰林院侍读，署掌院事。嘉靖二十一年入阁，二十三年成为首辅。二十四年夏言复为首辅，二十五年夏言因议复套被杀，严嵩重为首辅，从此权倾朝野。明史言严嵩“无他才略，惟一意媚上，窃权罔利”。严嵩入阁时，世宗已深居西苑，专事修仙炼丹少与外人接。除方士外，严嵩具有这个便利，也由此捞足了政治资本。史载：“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，即不视朝，自二十年宫婢之变，即移居西苑万寿宫，不入大内，大臣希得谒见，惟嵩独承顾问，御札一日或数下，虽同列不获闻，以故嵩得逞志。”①严嵩利用窃取的权力大搞卖官鬻爵、贪赃枉法的勾当。嘉靖三十一年，南京御史王宗茂数嵩

①《明史》卷三〇八《严嵩传》，第 7917 页。

八大罪状，其一言："嵩本邪谄之徒，寡廉鲜耻。久持国柄，作威作福。薄海内外，罔不怨恨。如吏、兵二部每选，请属二十人，人索贿数百金，任自择善地。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。"依靠此途径，严嵩聚敛了巨额财富。王宗茂言："陛下之帑藏不足支诸边一年之费，而嵩所蓄积可赡储数年。""辇载珍宝，不可数计。金银人物，多高二三尺者。"另外严嵩还"广布良田，遍于江西数郡""畜家奴五百余人，往来京邸"。[①]与此相反，民困兵疲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，所谓"边卒冻馁，不保朝夕"[②]"四方贪墨之风，而闾阎日以愁困"[③]。张翀也言："国家所恃为屏翰者，边镇也。自嵩辅政，文武将吏率由贿进。其始不核名实，但通关节，即与除授。其后不论功次，但勤问遗，即被超迁。托名修边建堡，覆军者得荫子，滥杀者得转官。公肆诋欺，交相贩鬻。而祖宗二百年防边之计尽废坏矣。"[④]边防日坏，大批朝臣也提出了严厉批评，谢瑜言："武宗盘游佚乐，边防宜坏而未甚坏。

①《明史》卷二一〇《王宗茂传》，第 5566 页。
②《明史》卷二一〇《张翀传》，第 5566 页。
③《明史》卷二一〇《赵锦传》，第 5560 页。
④《明史》卷二一〇《张翀传》，第 5566 页。

今圣明在上，边防宜固而反大坏者，大臣谋国不忠，而陛下任用失也。”[①]徐学诗言：“大奸当国，乱之本也。乱本不除，能攘外患哉？”[②]吴时来更是鞭辟入里，言：“今边事不振，由于军困；军困由官邪，官邪由执政之好货。”[③]嘉靖二十九年发生的庚午之变是边防日坏的一个很好例证。

严嵩笼络了一大批奸佞小人，又对其子严世蕃极其放纵，父子二人排除异己，操威弄权，使嘉靖朝纲雪上加霜。严嵩辅政十年后，嘉靖政治已经跌入深渊。沈炼批评道：“（严嵩）严然以丞相自居，挟一人之权，侵百司之事。”[④]“要贿鬻官，沽恩结客。朝廷赏一人，曰‘由我赏之’；罚一人，曰‘由我罚之’。人皆伺严氏之爱恶，而不知朝廷之恩威，尚忍言哉。揽吏部之权，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，致官方大坏；阴制谏官，俾不敢直；妒贤嫉能，一忤其意，必致之死；纵子受财，敛怨天下；运财还家，月无虚日，致道途驿骚；久居政

①《明史》卷二一〇《谢瑜传》，第 5549 页。
②《明史》卷二一〇《徐学诗传》，第 5553 页。
③《明史》卷二一〇《吴时来传》，第 5563 页。
④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卷五四《严嵩用事》，杨继盛劾严嵩疏。第 25 页。

府，擅宠害政。”①

其他朝臣的奏章也可以佐证。

徐学诗上言：“大学士嵩辅政十载，奸贪异甚。内结权贵，外比群小。文武迁除，率邀厚贿，致比辈掊克军民，酿成寇患。……举朝莫不叹愤，而无有一人敢抵牾者，诚以内外盘结，上下比周，积久成势。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，擅执父权。凡诸司奏请，必先白其子，然后敢闻于陛下。”②

刑部主事董传策于嘉靖三十七年上疏言：“吏、兵二部持选簿就嵩填注。文选郎万可寀、职方郎方祥甘听指使，不异卒隶。……嵩久握重权，炙手可热。干进无耻之徒，附膻逐秽，麕集其门。……嵩以蔽欺行其专权，生死予夺惟意所为。而世蕃又以无赖之子，穷威助恶。父子肆凶，中外饮愤。”③

朝臣强烈要求世宗除掉严嵩父子以正本清源。时臣赵锦言：“臣

①《明史》卷二一〇《沈炼传》，第 5534 页。
②《明史》卷二一〇《徐学诗传》，第 5553 页。
③《明史》卷二一〇《董传策传》，第 5568 页。

愿陛下观上天垂象，察祖宗立法之微，念权柄之不可使移，思纪纲之不可使乱，立斥严嵩，以应天变，则朝廷清明，法纪振饬。”①但严嵩非但没能被及时罢斥，谏诤之臣却接二连三地遭到打击报复，如谢瑜、叶经、童汉臣、赵锦、王宗茂、何维板、王晔、陈垲、厉如进、沈炼、徐学诗、杨继盛、周鈇、吴时来、张翀、董传策等或贬或杀，惨遭迫害。

①《明史》卷二一〇《赵锦传》，第 5562 页。